

■ 政德镜鉴⑩

政治上，他不畏皇权，数度交锋，多次发逆耳忠言。学术上，他是魏晋时首屈一指的经学家，以“王学”动摇“郑学”的统治地位。

王肃：亮直多闻，遍注群经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戴章超

秋末冬初的鲁南郯城县，天地苍莽，草木摇落，已是一片萧索景象。在沂水南畔的土地上，点缀着一个名叫王桥的村落。村庄郊外，萋萋荒草中矗立着一座高约7米的巨大石碑。据碑文记载，这是曹魏名臣、司徒王朗的陵墓。

王桥村民多姓王，同尊王朗、王肃为先祖。三十年前，村民王柏恒曾参与编修家谱，认真寻找家谱中王朗和王肃的印记。“我们是汉魏时期大臣王朗的后裔。王朗有一子叫王肃，我们也是经学大家王肃的后人。”80岁的退休教师王绍宗说。

王朗父子属东海王氏，是魏晋时期的名门望族，在政治和学术上皆有不俗成就，其流绪一直延绵至南朝。而将家族学术成就推至巅峰的，当属王朗长子、一度以“王学”取代“郑学”（郑玄）的王肃。

生于离乱，漂泊江湖

王肃学术成就的取得，既有勤奋好学的天性使然，也有醇厚家学的熏染所致。自幼年开始，王肃就跟随父亲王朗学习经籍，在古籍的浩瀚汪洋里汲取营养。

王肃之父王朗的形象，在小说演义里、正史记载中，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。

章回体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王朗性格迂腐，甚至颇为可笑。曹魏篡汉后，王朗以元老功臣之故进位司徒，跻身朝廷“三公”之列。不久，蜀汉丞相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中原，王朗已年届七旬，自觉老当益壮，主动请缨赶赴前线。两军阵前，王朗异想天开，想以“天命”说服诸葛亮“弃暗投明”，主动归降曹魏。没想到，口才极佳的诸葛亮频频挖苦王朗，甚至以“皓首匹夫，苍髯老贼”相讥讽。王朗气急攻心，方寸大乱，竟失足从马上摔落而死。

《三国志》记载的王朗，则是另一副面孔。他“才学博洽，淹贯群经”，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。王朗年轻时，矢志于求学问道，曾师事《欧阳尚书》的传人杨赐。杨赐出身著名的“弘农杨氏”，祖父杨震、父亲杨秉皆担任过东汉的太尉。

汉末多事之秋，一大批清流士子有感国事日非，奋而抨击社会混沌黑暗。起初，杨赐“不应州郡之命”，超然于政治之外，也借着灾异批评外戚干政、宦官擅权。他讥讽皇帝“内多嬖幸，外任小臣”，讽刺朝政“妾媵嬖人阉尹之徒，共专国朝，欺罔日月”。

杨赐对现实政治的关注，深深影响了学生王朗。杨赐病故后，王朗“弃官行服”，坚持



后世重筑的王肃父亲王朗墓碑 鲍青 摄

为恩师守孝，矢志继承杨赐的学术思想。

王朗后拜郎中，担任一县长官，又擢升会稽太守（治所在今江苏苏州）。

王朗赴任会稽的第三年，即汉献帝兴平二年（公元195年），长子王肃在府衙内降生。儿子的降临，并未给年近四旬的王朗带来太多的欣喜。他凝神注视北方中原，心忧愈燃愈近的烽烟。

此时的东汉王朝，已经彻底陷入混乱状态。自黄巾事起，朝廷被迫允许地方自行募兵镇压，渐成军阀割据形势。董卓之乱后，皇权坠地，天下失序，军阀间起攻讦，战火屡燃。关中地区，原属董卓的部将李傕、郭汜起兵相攻，惊魂未定的献帝在大臣护送下逃回故都洛阳；曹操和吕布两强对峙山东，连年交兵，全力争夺兖州地区。黄河以北，袁绍联合多方势力，和公孙瓒激战正酣。

北方乱麻一团，南方尚属平安。王朗忧心形势变化之余，也在会稽施行自己素来推崇的“德政”。他招徕流民，发放牛种，不兴甲兵，大兴文教。王朗以经术移风易俗，对不符合儒家道德的习俗尽力裁决。他发现当地民俗喜欢祭祀秦始皇，甚至将秦始皇木像置于夏禹庙中。王朗认为秦始皇是暴虐之君，不应隆重祭祀，就下令除之。

王朗在会稽任职四年，深受百姓爱戴，也引起朝廷关注。

可惜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王肃出生的次年，战火终究燎原而来。在军阀袁术处借兵的孙策，决定经略江东富庶之地。他连战连捷，席卷江东，很快将矛头对准会稽。

王朗虽擅长经术，勤于治民，却于兵戎无所成就。因为自觉身为汉吏，应保城邑周全，只能硬着头皮率兵出战孙策。王朗连遭败绩，只能带着妻儿老母，泛舟浮海，朝不保夕，恍如惊弓之鸟。尚为婴儿的王肃，时常饮食不继，险些夭折。最终，王朗一家走投无路，被迫投降孙策。孙策敬重他声望儒雅，只责备而不加害。

朝廷闻王朗困于江东，征召其人入朝为官。尚在襁褓的王肃，又跟父亲舟车泛海，辗转一年之余才到达京师。

来到京师后，王朗生活较为安定，王肃也得以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童年。他跟随父亲左右，学习儒家典籍，探索只言片语背后潜藏的治国安民之道。

因为家庭氛围耳濡目染，王肃自幼就喜爱研读文史，对经学也有独到的见解。十八岁时，他拜汉末大儒、荆州学派代表宋忠为师，向他学习西汉学者扬雄的《太玄》。

《太玄》是扬雄所著的一本哲学书。扬雄在此书中将源于老子的“道”作为哲学最高范畴，并以“玄”作为构筑宇宙生成模式、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中心。扬雄写作《太玄》时，有意炫才显能，将文章玄妙化。所以《太玄》义理极为深奥，很难理解。王肃年纪轻轻，就不能读懂此书，还能发表诸多新颖看法，有着异于常人的领悟力。

名师宋忠教诲不倦，学生王肃苦学继日。到二十多岁时，王肃经学造诣突飞猛进，已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经学家。

屡上奏疏，屡言国事

性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王肃出身名门高第，又淹通经史文集，自然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
魏文帝黄初年间，20多岁的王肃被拜为散骑黄门侍郎，掌管谏言献策，“入则规谏过失，备皇帝顾问，出则骑马散从”。

魏明帝太和二年（公元228年），父亲王朗病故。次年，王肃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。

太和四年，掌握兵权的大司马曹真上表，请求发兵征讨蜀汉。他乐观地估计：“蜀连出侵边境，宜速伐之。数道并入，可大克也。”魏明帝对曹真之议也深以为然，立刻应允，并亲送他率军出征。

对伐蜀之议，部分大臣虽有异议，却因畏惧曹真而不敢公开表露。王肃当时官位卑微，资历浅薄，却没有这般顾虑。他自认身居谏官，就该进献直言，不可随人俯仰。摇曳的烛光下，王肃将心中所思倾笔写出，指出仓促出兵伐蜀的诸多危害。

拂晓天明，王肃上奏皇帝，为退兵鼓呼。在这次辩论中，王肃展现了自己敏锐的巧思和渊博的知识。面对群臣的责难，王肃先引用历史经验，指出即使平路行军也深受粮草不继的困扰，“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”。何况巴蜀山川环绕，险阻隔绝，经常需要凿山搭桥才能进军，比平路行军要劳累百倍。如今又值阴雨连绵，山坡陡峭湿滑，军队拥塞难以行进。而军需粮草远在千百里之外，一旦供应断绝，军卒乏食，士气必然崩溃。

辩论之时，曹真大军出发月余才通过半个子午谷的情报传来，更增强了王肃据理力争的信心。王肃立即指出，大部分魏国士兵被分派去修筑道路，已经疲惫不堪，一旦蜀军占据险要地形，以逸待劳，大军或将有去无回。王肃又征引历代故事，强调“（周）武王伐纣，出关而复还；论之近事，则（魏）武、文征（孙）权，临江而不济”。进军犹豫不决的背后，都是后勤保障难以跟进的缘故。他恳请朝廷下令，因“雨水艰剧之故，休而息之”，调回出征大军，放归服役百姓。王肃觉得如果这般的行军，服役百姓必然感恩戴德。而这种民意日后会有大用处，“后有衅，乘而用之，则所谓伐以犯难，民忘其死者矣”。

魏明帝经过一番深思，决定停止征讨蜀汉，召曹真回朝。

朝堂激辩，为王肃赢得满堂彩，也激发了他上疏言事的热情。他接着上疏，要求遵循旧礼，为故去的大臣发哀，更要将有功大臣祭祀于宗庙。此议一出，得到群臣应和，得以顺利通过。

不久，王肃又上疏阐述“政治根本”。他请求刷新吏治，“除无事之位，损不急之禄，止浮食之费，并从容之官”。经过这些改革之后，“使官必有职，任职其事，事必受禄，禄代其耕”。官员既有明确职责也有对应俸禄，自然能勤垦为政，也便于日后追责。

王肃精研儒学，也仰慕古代礼制，因而在奏疏中时常“以古论今”，强调“古为今用”。他认为魏国官制起于汉末战乱之世，有诸多欠缺不足之处。他根据古代经验，提出各代官制设置情况，供皇帝参考斟酌。如唐（尧）、虞（舜）上古时期，官制较为简单，“设官分职，申命公卿，各以其事”。到夏、殷时期，“六卿亦典事者也”。周代官制更加齐备，“五日视朝，公卿大夫并进，而司士辨其位焉”。到了汉代末期，因为皇帝昏庸信任宦官，导致“朝礼遂阙”。王肃提出“可复五日视朝之仪，使朝尚尚书各以事进”。在他心目中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“废礼复兴，光宣圣绪，诚所谓名美而实厚者也”。

王肃奏言，不仅切中时弊，而且引经据典，颇有说服力。这和他深厚的经学造诣是分不开的。

君臣交锋，不卑不亢

因为奏言得到皇帝肯定，王肃以常侍之职负责秘书监工作。景初元年（公元237年），大权独揽的魏明帝沾沾自喜此前取得的文治武功，渐渐变得骄奢淫逸。他大修宫殿，广采民女，导致“民失农业……刑杀仓卒（促）”，天下渐现不安之象。

王肃幽愤上疏，道出天下方趋安定、百姓刚得休息的不易，“大魏承百王之极，生民无几，干戈未戢”。此时朝廷应该与民休养生息，“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”。王肃认为休养生息的关键，在于“务畜积而息疲民，省徭役而勤稼穡”。针对宫殿营造屡兴，征调百姓频繁的现状

象，王肃谴责这将导致“丁夫疲于力作，农者离其南亩”的恶劣后果。长此以往，必然“种谷者寡，食谷者众，旧谷既没，新谷莫继”，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。

王肃请求魏明帝幡然醒悟，改弦更张，不可再对民力竭泽而渔。对于现行政策，王肃要求朝廷“发德音，下明诏，深愍役夫之疲劳，厚矜兆民之不瞻”。王肃有感徭役制度的随意，请求对徭役制度进行具体改革。他甚至提出了完善徭役制度的办法，“选其丁壮，择留万人”，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轮换，使百姓有休息时间。他还规定，每次轮换期总计三年时间，此后“分遣其余，使皆即农”，这样就能让百姓“劳而不怨”。

王肃乐观估计，如此施行，不久之后就会“仓有溢粟，民有余力”。他还鼓励皇帝迅速采取措施，“以此兴功，何功不立？以此行化，何化不成？”

在奏疏的最后，王肃又习惯性旁征博引，用历史事实来说服皇帝。他先用孔子之语“自古皆有死，民非信不立”，又指出区区别晋国，微微重耳，“欲用其民，先示以信”，最终能“一战而霸”。

相比历史经验，现实更加刺眼。此前魏明帝征调百姓时，官员经常声称宫殿一旦建成即遣返，后来又不断自食其言，引起服役百姓的骚动。王肃就此批评皇帝，“僭复使民，宜明其令，使必如期”，切不可言而无信。

王肃奏疏越写越激愤，越写越难抑，所以又批评皇帝任意加刑囚徒，有烂施淫威之嫌，让天下百姓战战兢兢、惊慌不安。王肃在奏疏末尾，要求魏明帝躬行节俭，“诸鸟兽无用之物，而有谷台人徒之费，皆可踰除”。

王肃连珠炮式的批评，让魏明帝大为不悦。他不好借此发作，便以他事寻机敲打王肃。皇帝借着研讨经史质问王肃：“东汉桓帝时，白马来李云上奏折说：‘孔子认为所谓帝，就是要谛听。’如今官位错乱，小人谄进，财货公行，政化日损，说明这个皇帝不想谛听。”李云此言可谓大逆不道，为什么最终只是病狱中，而没有被立即处死？”皇帝之意，是想让王肃为没有被惩治而感恩戴德。王肃却回答说：“李云只是说错了话，失去了违逆和顺从皇上的分寸而已。推究他的本意，说这些话都是想尽忠心，想着对社稷有益。而且皇帝之威，超过雷霆，杀掉一个普通百姓，和踩死蚂蚁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宽恕他，可以显示能容直谏之人的胸怀，杀掉李云一定是对的。”

魏明帝依旧不甘心，因而又问：“司马迁因为遭受刑罚缘故，心怀怨恨，写下《史记》来指责、贬低汉武帝，实在令人痛恨。”王肃回答说：“司马迁纪实史，不凭空赞美，不隐瞒恶行。汉武帝听说他写《史记》，拿来写汉景帝以及自己的本纪看，因为不满而大怒，削去简册上的字。现今这两个本纪有目录而没有文字。后来司马迁为战败的李陵辩护，于是汉武帝借机把司马迁送进蚕室施以刑罚。这表明心怀怨恨的是汉武帝，而不是司马迁。”

君臣两次你来我往、针锋相对的回答，火药味十足，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。

身抗玄学，预言吉凶

齐王曹芳正始元年（公元240年），王肃因数番奏言而出为广平（今河北南部）太守。王肃出京不久，又因公事征还，拜为议郎。数日之后，又拜为侍中，迁太常。

此时曹真之子大将军曹爽专权，信赖倚重何晏、王弼、邓飏等人。何晏、王弼好玄学清谈，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，谈玄析理，放达不羁。当时所谓名士风流，盛于维下，世称正始之音。

以儒道捍卫者自居的王肃，自然看不惯这种离经叛道的风气。他与太尉蒋济、司农桓范论及时政时，凛然正色曰：“此辈（何晏、王弼）即弘恭、石显（西汉元帝时期奸臣）之



王肃画像

属，复称说邪！”曹爽闻之，告诫何晏等人说：“当共慎之！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。”

王肃的女儿元元姬曾嫁于司马昭为妻。等到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诛杀曹爽后，王肃更受礼遇，其言语建议在朝堂也愈有分量。当时有两条长约一尺的鱼，突然出现在朝廷武库的房间里。百官觉得这是吉祥之兆，王肃却说：“鱼生于渊而亢于屋，介鳞之物失其所也。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？”不久，司马昭果然在对抗东吴的战斗中失利。

嘉平六年（公元254年），齐王曹芳被废，王肃持节兼太常，迎接高贵乡公于元城。不久，镇东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反叛，司马师向王肃说：“霍光感夏侯胜之言，始重儒学之士，良有以也。安国宁主，其术焉在？”王肃对答：“昔关羽率荆州之众，降于禁于汉滨，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。后孙权袭取其妻子家属，羽士向一旦瓦解。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，但急往御卫，使不得前，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。”司马师听从王肃意见，很快打败俭、钦二人。

兼善今古，自成一家

在曹魏时期，王肃以擅长经学而闻名天下。他早年熟读东汉经学家贾逵、马融的著述，却唯独不喜欢郑玄的学说。

郑玄创立的经学体系，在东汉后期占学术主导地位。郑学属于训诂经学，讲究字义的理解阐述，但相对缺乏哲学思辨。汉末魏晋时，就有人批评郑学的疏漏。王肃的恩师宋忠，曾探讨天道性命，与郑学相抗衡。

王肃兼通今古文，更发扬恩师思想，以激烈反对郑学为特色。他对自己在经学上的标新立异曾有过表白：“郑氏学行五十载矣。自肃成童，始志于学，而学郑氏学矣。然寻文责实，考其上下文理，不安违错者多，是以夺而易之。然世未明其敦情，不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前人。乃慨然而叹曰：‘予岂好难哉？予不得已也！圣人之门方壅不通，孔氏之路荆棘充焉，岂不得开而辟之哉……’”

王肃为了对抗郑玄，不仅遍注群经，甚至伪造《孔子家语》《孔丛子》以及《圣证论》。当时能独树一帜并以注经数量与郑玄相比肩者，唯有王肃一人，一时有“王学出而郑学衰”的现象。

王肃在经学上纠正了郑玄不少荒诞之说，弥补了“郑学”疏漏，为后世学者服膺。王肃还用儒家的“礼”来融合教化与名法，成为魏晋之际礼法理论最重要的建设者。

司马懿时，大臣奏请把王肃《孝经注》列入学官。后来王肃和父亲王朗的注解，都被列于学官。有关礼制方面的问题，王学与郑学若发生争议，一概以王肃之说为准。甘露元年（公元256年），拥护郑学的高贵乡公视察太学，以郑学的义理来责问在座的博士。而王肃的学生、博士庾峻则以王肃“奉尊师法”为由，把皇帝的质问挡了回去。

自魏至西晋，“王学”一度压倒“郑学”。东晋以至南北朝以后，郑学在经学领域地位得到恢复。东晋以降，王学又被郑学压倒。但王肃的学术地位依旧得到尊重。贞观二十一年（公元647年），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，其中就包括王肃。大中祥符九年（公元1016年），宋真宗下诏追赠王肃为司空，并命近臣撰赞。

等到车驾还京，皇帝不管青红皂白，连夜派遣使者收缴杨震的大尉印绶。

杨震无辜被罢官，内心虽然怨恨，却只是“柴门绝宾客”，不再过问国事。杨震虽然退出政坛，但影响力犹在，因而依旧为樊丰忌恨。在宠臣一再唆使下，大鸿胪耿宝上奏，说杨震身为大臣，并不服罪，心怀怨毒。安帝再度听信谗言，下诏将杨震遣还家乡。

志尚高洁的杨震，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。他对朝政心灰意冷，决意用生命作最后的抗争。《后汉书·杨震传》载，（杨）震行至城西几阳亭，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：“死者士之常分。吾蒙恩居上司，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，恶儿女倾乱而不能禁，何面目复见日月！身死之日，以杂木为棺，布单被裁足形，勿加家次，勿设祭祠。”说完之后，他饮鸩酒而卒。

杨震死后，内宠仍不放过他，留其丧于陕县，“露棺道侧”。路过的百姓，看到杨震棺槨，“皆为陨涕”。

一年多后，安帝病死。顺帝在新的宦官势力支持下登基为帝。此前杨震反对的“内宠”相继失势，新的势力需要重新调整权力布局。因而“朝廷咸称其（杨震）忠，乃下诏除二子为郎，赠钱百万，以礼改葬于华阴濯亭，远近毕至”。

·相关阅读·

五十岁以前的杨震隐居乡间，后以学术救世的心态步入业已腐败的官场。他恪守个人道德理想，

直道而行，试图通过个人改变东汉官僚，并不惜为之献出生命。

杨震：献身理想的“关西孔子”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王肃的父亲王朗曾跟随出身“弘农杨氏”的杨赐学习经籍，奠定了自己成为一代经学名家的基础。弘农杨氏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名门，而奠定家族声望的，是杨赐的祖父、被誉为“关西孔子”的杨震。

杨震是东汉名臣，以“天知地知你知我知”的四知而流芳后世。杨震的成名，对弘农杨氏的影响甚大，奠定了其作为世家大族中的地位。

杨震幼年孤贫而好学，不仅攻习《欧阳尚书》，也对儒家其他经典有深入研究。因为学识渊博、品德高尚，儒生称他为“关西孔子杨伯起”。

杨震虽声名在外，却不应州郡官员的征召。他隐居乡野，开馆授徒，靠种地奉养老

母。到了五十岁时，因为政治较为清明，杨震有了“盛世则仕”的念头。他开始到州郡为官，很快声名鹊起。邓太后之兄、大将军邓骘喜欢推进贤才，将杨震征召到自己的幕府中。从此杨震仕途平顺，先后任荆州刺史、东莱太守、太司农、司徒，最后官居太尉。

邓太后过世后，汉安帝开始亲政。因为受到压制十多年，汉安帝一反邓太后清明的施政理念，信任奸邪、宠幸宦官，朝政越来越昏暗。当时杨震任司徒，职位虽高，却无实权，诸事被迫听命“内廷”。

杨震虽无决定权，却有谏言权。他眼见国是日非，心中愤懑难平，借着天降灾异，屡次上疏劝诫皇帝，言辞相比后世著名谏臣魏征、海瑞也毫不逊色。但安帝沉溺享乐，对杨震逆耳忠言只是充耳不闻。杨震性情直率，只要皇帝不安分守己，他就奏疏接连不断。杨震奏疏

越来越频繁，言辞也越来越激烈。

杨震后来由司徒转任太尉，依旧耿介如昔。安帝的舅舅向杨震托请，希望他安排使用宦官的亲属，被杨震拒绝。国舅又亲自登门拜访，更以宦官权势相威胁，杨震依旧不应。皇帝下诏为宠臣修建宅第，杨震又上疏直言，以“百姓穷困，外敌猖獗，国库空虚”相阻止。

杨震见皇帝闭目塞听，只好借助“天人感应”来予以警告。他在奏疏中认为，如今天地震频发，干旱肆虐，正是皇帝亲近幸臣，任其骄奢淫逸的后果。杨震希望皇帝及时醒悟，“绝婉恋之私，割不忍之心”。宠臣见杨震屡谏不成，在怨恨日深的同时，也更加肆无忌惮。

延光三年（公元124年），安帝巡幸泰山。宠臣樊丰等人趁着皇帝不在，“调发司农钱谷、大匠见徒材木，各起家舍、园池、庐观，

役费无数”。杨震从他处掌握到樊丰矫诏贪污的证据，决定等安帝回京后就上奏弹劾。樊丰惊慌失措之下，决定联合宦官诬陷杨震。

恰在此时，一位名叫赵腾的普通士人上书批评朝政。安帝以为上疏乃官员之事，升斗小民贸然上疏，不合礼制。在一千宠臣的怂恿下，安帝将赵腾下狱，并定为死罪。杨震闻讯，紧急上疏，请求轻治赵腾之罪。但安帝不为所动，执意将赵腾“伏尸于市”。

当时太史官言“星逆行”，樊丰趁机借赵腾之事大做文章。他们构陷谗言，共诬杨震：“自赵腾死后，深用怨忿；且邓氏故吏，有怨恨之心。”

安帝隐忍在邓太后羽翼下十多年，对太后的情感由起初的感恩变为仇恨。他自从亲政后，不断增强个人权力，接连罢黜邓太后旧臣。樊丰的谗言，恰好戳中安帝内心的痛处。